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劳动理念书写

焦润明 洪业智

【提要】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政权为强化对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其形成尊重劳动人民的意识、养成热爱劳动的风气,就需要加强历史教科书中的劳动理念书写,借以灌输并养成学生们的唯物主义劳动观。“劳动创造人”“劳动工具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等命题皆为核心的书写范式。这种体现革命史话语体系的书写范式的确立又与中国初期注重宣传唯物主义、崇尚劳动光荣、突出劳动人民社会地位的整体社会氛围“同频共振”,取得了极佳的社会效果。

【关键词】 新中国初期 历史教科书 唯物史观 劳动理念 历史书写

本文所指新中国初期,特指1949—1957年这一时期。有关历史教科书中所涉历史观的研究是近年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由此产出一批成果。但这些成果大多以清末或民国时期的教科书为研究对象,或以历史事件与人物为研究视角,^①探讨社会宏观背景如何影响历史教科书中的叙述对象;有的以史观为中心,^②说明教科书中所蕴含的史观表现及其来源,有的则直接将时代背景作为影响教科书编写的因素进行重点考察,^③也有对历史教科书发展与研究脉络进行梳理的。上述成果都有自己的贡献,只是对新中国初期历史教科书历史观内容的研究相对较少,尚未见到以马克思主义劳动理念为视角对新中国初期历史教科书进行系统考察的成果,为本文留下了讨论空间。

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劳动理念书写源头,至少可以追溯至解放区的教科书,在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已在最初的教科书中为劳动理念的融入提供了基本范式表述。由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节录而来的《高级中学中国历史》、由廖盖隆的《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修订而来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以及原本为陕甘宁教科书后又经编

① 参见何成刚、李美《清末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中的“太平天国运动”》,《北京教育学院院报》2004年第3期;赵梅《清末以来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美国形象》,《美国研究》2006年第4期;李卿《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中国古代历史人物评价原则初探》,《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1期;刘超《孔子形象:历史知识与社会意识——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李帆《民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戊戌维新及康有为》,《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李培健《制造知识: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建构》,《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② 参见李帆《清季的历史教科书与线性历史观的构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2期;徐蓝《让世界史教科书成为唯物史观教育的重要支点》,《课程·教材·教法》2020年第6期。

③ 参见周朝民《戊戌变法后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李孝迁《新旧之争: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东南学术》2007年第4期;张运君、管西荣《晚清历史教科书编审中的国家认同建构》,《出版科学》2020年第2期;李帆《“共和”叙事:切近的历史表述——民国前期历史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民国档案》2021年第4期。

者叶蠖生修订的《初级中学中国历史课本》都是新中国第一批历史教科书中的典型代表。它们的使用代表了国家将历史学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基本态度。于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们的著作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历史教科书的范本,为其后历史教科书的发展奠定基本走向。而劳动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伴随着新中国对意识形态与劳动教育的重视而在教科书中得到进一步加强。

从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层面看,向社会大众普及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是国家政权进行意识形态重塑的重要途径。195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的通知》,要求特别注意“教材的准备”。^①该通知附带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也提出要注意“理论的通俗化工作”。^②3月27日,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中又说“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③其中,劳动与劳动理念教育,又是社会主义价值观重塑的重要内容,“劳动光荣”已被明确写入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之中。国家各部门负责同志亦非常重视教育与劳动之间的关系,1954年1月27日,习仲勋在全国中学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与劳动是分不开的。”^④钱俊瑞则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要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劳动态度”,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就要对教材进行“审查”。^⑤3月13日,习仲勋在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1954年的中等教育工作要注重“修订教材”,“用先进的科学知识,社会主义的思想,热爱劳动和遵守纪律的精神,去教育青年和儿童”。^⑥6月5日,政务院公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在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教科书编写成就的同时,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就一定不能忽视“劳动教育”。^⑦总之,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明确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在教科书中突出劳动理念的重要性,这一工作随着1954年后教学大纲和教学大纲版教科书的陆续出版而获得圆满体现。

一、贯彻“劳动创造人”的核心理念

“劳动创造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通过劳动确定的。人与动物的差别在于是否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而人所具有的意识使人成为一种“类存在物”,这种“类存在物”还需要一个对其进行确认的过程,这样,“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⑧这个过程是“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劳动”。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本质是在劳动的过程中确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的通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111页。

③ 毛泽东《给李达的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

④ 《中央文委习仲勋副主任在全国中学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

⑤ 钱俊瑞《关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问题》,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288页。

⑥ 《1954年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294页。

⑦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

⑧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定的,这是马克思对“劳动创造人”的基本论断。

恩格斯认为,达尔文所描述的一种生活在树上的类人猿正是人类的祖先,丛林的环境和树居的生活习性使这种类人猿形成手脚的早期分工,这是“从猿过渡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使类人猿进一步与其他动物扩大区别,并使其进化成人类。正是与脚形成分工的手能够逐渐制造出简单的工具,即便是最简单的工具,也是极为重要的进化标志,因而,恩格斯认为“任何一只猿手都不曾制造哪怕是一把最粗笨的石刀。”^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对教科书塑造“劳动创造人”的理念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20世纪40年代,也将唯物主义思想宣传推至一个高峰。解放社编写的《社会发展简史》以“谁是我们的祖先”开启全文,又以“劳动创造了人”作节之标题,^②开启人类因制造和使用工具而走下树木,进而直立行走的历史讲述。艾思奇的《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亦以“猿为什么变成人”之问和“制造工具,使用工具以进行劳动生产,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是人和动物的最根本的区别”之答,^③展开人类社会形态演变历史的讲述。

在新中国初期的历史教科书中,凡涉及人类历史开端时,无不以“劳动创造人”这一论断作为开篇。新中国最初使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开门见山地将“恩格斯告诉我们说‘劳动创造了人’”的这一表达放在绪论中,^④以突出其重要性。恩格斯认为最早的劳动工具是用于渔猎的,这使人类将动物的肉纳入食物来源,而肉食引起“两个新的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⑤这种论断已被编写者们融入历史教科书之中。高中历史教科书在引言中为说明劳动创造了人,将远古时期的人类“已经知道用火,能制造粗糙的石器”这一论断作为全书正文的首句。^⑥初中世界历史教科书叙述道: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关键在于“他们学会了用火和制造各种工具”。^⑦可见,教科书中对“劳动创造人”进行书写的最初形态是围绕制造工具和火的使用进行的,其理念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

1952年后,教科书自编工作渐入轨道,初中中国历史教科书叙述道:中国猿人是“从猿进化来的,他们能够制造工具,开始和兽类有了明显的区别。他们是人类的祖先。”^⑧初中世界历史教科书则叙述道“几十万年以前,地球上开始出现了劳动工具。尽管那些工具是最粗糙的……可是就从那个时候起,使用劳动工具的人类祖先开始跟其他的动物有了区别。”^⑨这类论述相较于之前教科书对“劳动创造人”的叙述更为丰富,语言风格也呈现一致性趋势。

随着1955年至1957年大纲版教科书问世,这种一致性被进一步强化。例如,有教科书写道:“在很远的古代,就有人类在祖国的土地上劳动着,生活着”;^⑩另有教科书这样表述“在祖国广大的

①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60页。

② 解放社编《社会发展简史》,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2页。

③ 艾思奇《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订正本)》,《艾思奇全书》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④ 叶蠡生编《初级中学中国历史课本》(修订本),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3页。

⑤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765页。

⑥ 前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节录、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修订《高级中学中国历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版,第2页。

⑦ 沈长虹编《初级中学外国历史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版,第1页。

⑧ 李庚序、王芝九编《初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1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版,第1页。

⑨ 王芝九编《初级中学课本 世界古代史》第1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第3页。

⑩ 汪篪、邱汉生、陈乐素编《初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1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5页。

土地上,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生活着,劳动着。”不仅如此,它们对劳动与人类的双手之间的关系也有明确的叙述“中国猿人制造劳动工具,开始跟动物有了根本的区别,他们的前肢才真正变成了手。”^①这样就把“劳动创造人”的理念简洁明了地展示出来。

“劳动创造人”理念的书写,在新中国初期的历史教科书中迅速确立并逐渐完善。无论初中还是高中的教科书,在述及人类历史开端时,皆以《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著为蓝本,并把“劳动创造人”这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作为全书的书写起点。从书写形式上看,对“劳动创造人”的书写,在教科书版本尚未统一之时各有表达,但随着国家统筹编写教科书工作的推进,“劳动创造人”的叙述更加凝练,其语言表述亦日益呈现较强的一致性。

二、强调“劳动工具是社会发展的标志”

“劳动工具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探讨不同社会形态跨越的标志性论断。在新中国初期历史教科书中,对社会形态的探讨主要围绕着“演变”,即围绕着一种社会形态是如何进入另一种社会形态中去的演变过程进行阐述。1956年教学大纲明确强调,要使学生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一定的认识,使其深刻地认识到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②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新中国初期教科书对劳动工具的书写,正是通过劳动工具的生产力属性来描述社会形态的演变过程。“劳动工具是社会发展的标志”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在结合对新石器、青铜器、铁器书写的完善中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形成动因描摹得更加清晰,也给工业革命后的阶级分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以背景解释。此外,它还具有较明显的领域分布特征: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前三种社会形态的书写更加详实,对后二者的叙述则集中在世界历史教科书中,且它们中的部分表述,同样明显地表达了唯物史观。

对新石器与原始社会之间关系的叙述在1953年及以前的教科书中已然存在,相关教科书将“石器的改进”单列,借以突出强调劳动工具的作用。譬如,通过补入“把石块打成适用的形体以后还要磨光”,弓箭“可以多打死野兽”,陶器“可以盛东西,可以煮饭”等内容,论述“劳动工具改进了,生产力随着提高了”这一观点,^③并通过“氏族社会”内容的叙述,完成新石器和原始社会关系的基础构建。1955年后的教科书进一步扩充这一叙述内容,介绍由骨、蚌等磨制而成的针、锥、镰等磨制石器,强调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重大发明”。“弓箭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武器”,弓箭的威力因为制作工艺的改进而大大加强,“用弓箭可以射击远处的鸟兽,猎取食物就比较容易了”,正是弓箭的发明与改进,使猎物能够得以积累,“他们慢慢地学会驯养猪、狗、牛、羊”。^④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工具——弓箭带来的猎获能力提升,成为畜牧业出现的重要背景。可见,劳动工具的书写被进一步加强。高中教科书明确认定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才从“猿人”发展成为真正意

① 邱汉生、陈乐素、汪篔编《高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1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页。

②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③ 李庚序、王芝九编《初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1册,第3、4页。

④ 汪篔、邱汉生、陈乐素编《初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1册,第10页。

义上的人,这是因为新式劳动工具的出现改变了劳动模式,蚌制、石制的镰刀出现,使人类从采集经济走向种植经济成为可能,他们“用尖头的木棒松土”,不仅“种谷子、黍子和麦子”,还“种麻”。^①

新中国初期教科书在对劳动工具的书写强化中形成以对磨制石器及其影响的介绍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书写框架,这个框架还被填入越来越丰富的细节性描写,在介绍人类制造陶器时说他们“把陶泥捏成坯子,画上红色、紫色或黑色的图案”,在介绍人类使用陶器时说他们把陶器“摆在高低不平的地上很稳当”。正是这些逐渐丰富起来的叙述支撑起“灿烂的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早期的氏族公社从萌芽状态逐渐发展到稳定状态,进而“母系氏族就被父系氏族代替了”,^②这种转变是依赖重体力劳动的畜牧业和种植业的出现带来的,而畜牧业和种植业的出现正是各类新石器工具广泛应用后的结果。

对青铜器与奴隶社会之间关系的叙述,在新中国初年的改编教科书中已有说明,“铜器时代”是使人类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的基础。1952年后的教科书对青铜器的书写日渐丰富起来,这一时期的初中教科书在解释奴隶社会的形成时,已非常具体地展示出一个“金属工具发明——生产力提升——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分工、氏族生产转为家族生产——剩余产品积累、劳动工具私有——富裕家族出现——奴隶主阶级形成”的叙述逻辑。这一叙述显然来源于恩格斯的思想。他认为,早期人类历史中有两件重要成就“第一是织布机;第二是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铜、锡以及二者的合金——青铜是顶顶重要的金属;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③同时,金属工具的出现使劳动产出增加,进而形成社会分工,从而“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④编写者们将这种来自经典作家的思想融入教材,将青铜器如何催生出奴隶社会的作用路径展示得更加清晰。这实际上是围绕劳动工具形成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叙述,其一,劳动工具改进带来的生产力提高是社会形态演变的总起点,是生产力视角下的书写;其二,占有劳动工具群体的变化,是生产关系视角下的书写。这种书写视角不仅说明劳动工具的改进及其占有情况的变化给社会形态演变带来重要影响,而且让劳动工具的书写模式从生产力视角下的一元叙事走向同时关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二元叙事,进而将青铜器与奴隶社会关系的叙述引向深入。1955年后的教科书对这个逻辑结构与叙事方式有所调整和简化,但基本继承了这一思路。

对铁器与封建社会关系的叙述,1953年版的初中教科书在结构上突出铁器的地位,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的内容中设“生产力的发展”小节,专讲铁器的发展及作用,明确指出铁器使“生产力提高了一大步”,并进一步说“生产力的发展,促成了土地所有关系的改变”。^⑤这实际上是以铁器的使用作为界点,将西周与东周的历史进行划分。1956年版的高中教科书不仅增加了冶铁技术的介绍,如冶铁炉的构造、吴国与晋国的冶铁成就等,还说伊洛之间“‘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荒地”被掌握铁器的劳动人民开垦后,^⑥排干了沼泽,修建了堤坝,建成了沟渠。较之前

① 邱汉生、陈乐素、汪篔编《高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1册,第12页。

② 邱汉生、陈乐素、汪篔编《高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1册,第12、13、9、15页。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7页。

④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8页。

⑤ 李庚序、王芝九编《初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1册,第17页。

⑥ 邱汉生、陈乐素、汪篔编《高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1册,第37页。

一时期,这时的教科书以铁器的使用规模为界点,将东周进一步细化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战国历史的讲述是由“大规模的冶铁事业”开启的,为突出这个“大规模”,教科书不仅介绍各国形成的冶铁业中心有“赵国的邯郸,楚国的宛,韩国的棠溪、邓师”等^①还加入一些考古成果做补充说明。显然,铁器是否大规模使用成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经过两次强化后,教科书中关于铁器书写更加清楚地剖析了西周、春秋、战国这三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关联与差异。即:铁器的使用是西周向春秋演变的重要因素,铁器的大规模使用是春秋向战国演变的重要因素,而对由铁器串联起来的三个时期的历史书写则展示了周至秦时期社会形态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演变的轨迹。

世界历史教科书将强化书写“劳动工具是社会发展的标志”这一观点的重点放在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生产上,主要关注工业革命中纺织机、蒸汽机及其发明者以及机器生产中孕育的新的社会变革趋势。这个书写强化中也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工业革命论述的印记。恩格斯讲道“1764年兰开夏郡的詹姆斯·哈格里沃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这种机器只要一个工人开动,就可以比旧式纺车多纺纱15倍。”^②恩格斯还对相关的四位发明家及其发明做了简要叙述。新中国初期的世界历史教科书将哈格里夫斯、阿克来、克伦普、卡特莱特等人的发明^③以及这些新式机器带来的效率提升作为“产业革命”叙述的主要内容,强调纺织机这一新工具对工业革命的促进作用。蒸汽机的意义更为重要,有教科书写道“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被应用到棉织业上去……接着这种蒸汽机的应用,迅速的普及到各种工业部门,全面的产业革命也随之完成。”^④这样的叙述反映了恩格斯所说“棉纺织业所得到的推动很快地传到其他工业部门”的观点。^⑤而“漂白、染色等工业也有改进”的论述,^⑥则是恩格斯对“我们已经看到,染色、印布和漂白是怎样通过纺和织的进步而发展起来”论述的转述。^⑦在介绍蒸汽机时,教科书还专门为瓦特配上一幅人物插图,以显示蒸汽机之地位,它的应用也被明确为“是英国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步骤”。^⑧上述内容无不典型地体现了“劳动工具是社会发展的标志”的唯物主义观点。

新中国初期历史教科书在加强对工业革命中的纺织机、蒸汽机书写的同时,也将它们的影响——自机器生产带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化与马克思主义诞生——叙述得愈加清晰。1950年的教科书已明确提出世界各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英国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模型改造了全世界”的结果。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欧洲各国的工人斗争活动本质上都是工业革命后“资本家暴富了,工人却更加贫困”的阶级分化带来的。^⑨1955年7月大纲版世界历史教科书付印后,“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被明确列为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和“科学共产主义”诞生的前提。^⑩这样,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生产对社会形态的两重影响被构建出来:其一,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它将英国资本主

① 邱汉生、陈乐素、汪篔编《高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1册,第47页。

② 恩格斯《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7页。

③ 四人名字与恩格斯所述译法不同,参见沈长虹编《初级中学外国历史课本》,第60页。

④ 沈长虹编《初级中学外国历史课本》,第61页。

⑤ 恩格斯《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9页。

⑥ 王芝九编《高级中学课本 世界近代史》第1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第21页。

⑦ 恩格斯《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0—541页。

⑧ 王芝九编《高级中学课本 世界近代史》第1册,第21页。

⑨ 沈长虹编《初级中学外国历史课本》,第61、63页。

⑩ 李纯武编《高级中学课本 世界历史》上册(第1分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68页。

的模式带给世界,促进世界各国的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转变;其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化给予了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背景,而马克思主义预言的又正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

统观新中国初期历史教科书中的劳动工具书写,可见它们已逐步建起并完善石器、新石器、铜器、铁器、工业机器之于人类社会的不同社会形态的重要作用的叙述。实际上,彼时史学界对工具与人的作用正有论辩,如范文澜曾提出在工具以外,“人力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当然不是说生产工具不重要,但比较起来,人力占更重要的地位。”^①他还在1953年所撰《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进一步强调,封建制的发生,“主要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推动,生产力得以前进,铜器和铁器,固然不必过于拘泥,甚至使用残存的石器,也不妨碍封建制的发生”。^②“如果不适当地过度强调生产工具,这就难免把历史描绘成为没有人参加的(或者说没有人的能动性的)各种经济过程的平稳的自行发展,把历史唯物主义改变成为经济唯物主义。”^③这是从另一视角对工业时代以前的生产概况进行回溯,小农的工具总是粗简的,早期的工具力量也是相对有限的。这样的唯物史观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初期的历史教科书书写。如强调铁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作用时,教科书首先强调“劳动人民掌握了铁工具,加强了对自然斗争的力量”。^④这一方面使教科书中的历史叙事免于落入“唯工具论”的窠臼,另一方面也提醒学习者应对劳动人民的作用有充分关注。

三、明确“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

恩格斯认为,供人们所使用的衣食住行等用品,多数是由劳动人民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毛泽东更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经典论断。^⑤历史学家范文澜于1949年连续发表《谁是历史的主人》《再谈谁是历史的主人》等文,强调“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⑥他还说“生产力是由生产工具和‘人力’组成的。‘人力’里面包括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生产工具是谁制造的?由谁来使用呢?很明白,生产工具是劳动人民制造的,也是由劳动人民使用的。例如工人造了铁犁,农民使用铁犁来耕种。既然生产力是历史的推动力,那么制造生产工具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劳动人民便是历史的推动者,也就无疑是历史的主人。”^⑦他又在《再谈谁是历史的主人》一文中进一步强调“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是劳动人民在一定的相互关系条件下拿着工具在生产物质资料”,^⑧明确提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观点。这些观点构成新中国历史教科书明确强调“劳动人民是历史创造者与推动者”的理论基石。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非常重视对工人、农民政治地位的塑造。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总纲的第一条

① 范文澜《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

②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全集》第10卷,第247页。

③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全集》第10卷,第248页。

④ 邱汉生、陈乐素、汪篔编《高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1册,第37页。

⑤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⑥ 范文澜《谁是历史的主人》,《范文澜全集》第10卷,第161页。

⑦ 范文澜《谁是历史的主人》,《范文澜全集》第10卷,第160页。

⑧ 范文澜《再谈谁是历史的主人》,《范文澜全集》第10卷,第165页。

明确规定,“工人阶级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是新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① 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②诚如它们所述,新中国为工农确立起的政治地位是历史教科书中加强对“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书写的根本之源,是“人民共和国”中“人民”的国家意志的贯彻,教科书对劳动人民的塑造是这一过程的重要体现。

劳动人民是社会经济基础的支撑力量。在新中国初期教科书的书写中,“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这一论述体现了劳动人民创造社会经济财富,是社会经济基础的支撑力量。对劳动人民的塑造已突出表现在1949年后改编的教科书中。中国史教材在叙及夏商周的历史时,强调剥削劳动是国家经济的主要来源。世界史教材在介绍古罗马时也说“贵族富人不事劳动,全靠奴隶劳动生产来养活他们”,“人类文明就是从奴隶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③1952年以后的教科书加强了对劳动人民在经济领域贡献的书写,这时的中国史课本已经明确指出奴隶主阶级的前身——富裕家族——的财产“主要是由剥削奴隶的劳动力得来的”。^④世界史课本中也可见相似的书写。例如,在古巴比伦部分,教科书写道“那时巴比伦的奴隶在奴隶主逼迫下辛苦劳动”;在亚述的部分,教科书写道“农民和一般城市的手工业者负担了大部分的国用”;在古印度部分,教科书则说“以农民为主的平民必须贡献必需的生产品给僧侣和武士……奴隶,他们必须为上面的三个自由阶级服役”;在斯巴达部分,教科书写道:斯巴达人“不从事生产劳动,柏里奥克人经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并向斯巴达人缴纳贡税,希洛人“为斯巴达人耕种田地,养活斯巴达人”;^⑤在雅典部分,教科书称它的经济是由奴隶和失地农民支撑的;在罗马部分,教科书先介绍罗马奴隶分“国有”和“私有”两大类,以及他们所承担的筑路、开矿和各类手工劳动,并说罗马的奴隶主“又往往雇佣贫农和无地农民补充奴隶劳动的不足”。直至对西欧中世纪的历史介绍中,仍可见这种叙事,教科书先讲这一时期的社会主要是由封建主和农奴构成的,又说国王、贵族、教会人员“他们都骑在农奴头上,依靠农奴的劳动而生活”。^⑥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教科书历史书写,认定奴隶是“劳动人民”,“贵族和巫师都不劳动,由劳动人民养活他们”。^⑦这里,“劳动人民”一词使用的明确化意味着对劳动人民书写的加强。

1955年后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不仅增加了有关劳动人民贡献的笔墨,也将“劳动人民”一词的使用进一步明确化。相关教材在介绍汉朝在西部地区实行屯田时称“汉武帝先后迁徙了劳动人民一百多万人到河套和河西走廊一带……他们勇敢地担负起保卫边疆的任务,又勤劳地从事生产……荒漠的地区出现了一片片碧绿的农田。”^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被明确为朝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由于农民的辛勤劳动,北宋初期的一百年间,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介绍清朝的经济时,教材这样写道“在近二百年相对安定的环境里,由于农民的辛勤劳动,农业生产恢复了,并且有些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450—451页。

③ 沈长虹编《初级中学外国历史课本》第19、22页。

④ 李庚序、王芝九编《初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1册,第6页。

⑤ 王芝九编《初级中学课本 世界古代史》第1册,第27、32、41、67页。

⑥ 王芝九编《初级中学课本 世界古代史》第2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第17、68页。

⑦ 李庚序、王芝九编《初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1册,第8页。

⑧ 邱汉生、陈乐素、汪钰编《高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1册,第93—94页。

发展。”^①劳动人民的经济贡献与国家机器运行的联系被构建起来后,对劳动人民经济贡献的书写就更为深刻。

总的来说,新中国初期的历史教科书不仅对“劳动人民”一词的使用逐渐明确化,而且将劳动人民的劳动贡献和剥削者的剥削更加突出化。如前所述,“剥削”作为“劳动”的对立面,对“剥削”的强化即是对“劳动”的强化,因此,站在这一角度上看,与其说对剥削书写的加强是为了体现对剥削的批判态度,不如说这种批判主要是为了突出劳动人民在经济领域的巨大贡献。

劳动人民推动了科技与文化的发展。教科书也将劳动人民与科技、文化等上层建筑联系起来,“在划分田地的经界和进行建筑的时候,埃及的劳动人民摸索到数学方面的基础知识”,^②太阳历也是从“农业生产的劳动里发明”。通过这样的叙述,进一步明确了“劳动人民”与科技的关联,“劳动人民推动了科技与文化的发展”也被更加明确地构建起来。

教科书讲到东汉时期南阳太守杜诗用水力鼓风的方法制造铁农具时,强调是“总结了劳动人民的经验”后得出的;讲到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时,教科书则说贾思勰是“总结了北部中国人民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经验”后著成的,^③还强调《齐民要术》的出现标志着北部中国的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中获得“重大的胜利”;在讲到北宋时期李诫的《营造法式》时,教科书强调作者是总结“我国劳动人民建筑技术的长期经验”后著成的;谈及元朝王祜所著的《农书》时,教科书则称其“保存了劳动人民的宝贵经验,具有重大的意义”。^④另外,对于时间过于久远而未能考证其确切归属的发明,该书也将其归功于劳动人民。书中介绍养蚕缫丝是黄帝时期出现的,是“人们长期劳动的成果”,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客观地说,这些总结中着力肯定劳动人民在“技术成果”上的贡献。譬如,在介绍汉代的科学成果时,有“在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的基础上,科学有巨大的发展……通过劳动实践,劳动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推动了数学和应用科学的发展”的概述;在介绍汉朝文化时,有“在汉帝国的广大疆土上,劳动人民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判断。^⑤科学和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劳动人民通过劳动提供的经济基础,这些判断可看作是该书对劳动人民与科学技术之间关系认识的一个基本反映。

农民起义是古代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劳动人民具备的“斗争性”显然是推动社会形态演变的一个重要力量。新中国初期的历史教科书重视对劳动人民遭受的剥削与压迫的书写,并以此作为叙述社会矛盾激化的前提,形成了“劳动剥削——矛盾激化——工农运动——社会变迁”的叙事逻辑。农民作为古代社会的主要劳动者,他们以农民起义的“革命”形式推动着王朝的更迭。

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很早就形成了剥削—反抗的叙事范式。在讲到商朝历史时,有“统治阶级的加重剥削逼使劳动人民不断地逃亡”的叙述。^⑥在古代农民起义中,最受关注的自然是陈胜吴广起义。在叙述这一内容时,教科书首先介绍秦朝筑驰道、修长城、开灵渠的成就,认为“这些伟大的成就都是统治阶级强迫劳动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工程完成的时候,劳动人民已经困苦到男

① 陈乐素、王永兴、李光璧、邱汉生、王芝九编《高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2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67、159页。

② 李庚序编《初级中学课本 世界历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26、27页。

③ 邱汉生、陈乐素、汪篪编《高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1册,第112、182—183页。

④ 陈乐素、王永兴、李光璧、邱汉生、王芝九编《高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2册,第116、117页。

⑤ 邱汉生、陈乐素、汪篪编《高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1册,第16、129、125—126页。

⑥ 李庚序、王芝九编《初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1册,第9页。

不得耕、女不得织的地步了。”^①继而它又指出,这场起义的原因是“继位的二世皇帝(胡亥)暴虐更是厉害”。^②这样的书写方式显然反映了剥削—反抗的革命叙事范式。1955年后大纲版教科书叙述的陈胜吴广起义,从文本的角度来看已经没有多少新的实质性内容被补入,但《大泽乡起义》的彩色插图是翻开这本教科书后映入眼帘的第一个突出信息。对近代农民起义中的太平天国运动,教科书也给予了较多笔墨,同样强调它是在阶级压迫下爆发的,是“商品和大烟像潮水一样的灌进来,中国人民的血汗,大量的流到外国去”的民族矛盾与“政府还大刮民脂民膏”的阶级矛盾叠加下的结果;^③突出太平天国运动的革命性,在称谓上以“太平天国革命”进行指代,并说它“一方面是二千多年来单纯的农民战争的终结,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④从社会形态演变的角度进行考察,这是塑造劳动人民是推动历史演进中主要力量这一观念的重要体现。1957年出版的教科书以“太平天国时期的先进思想”为标题,增加对《资政新篇》的介绍。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学历史教科书首次对《资政新篇》进行比较系统的介绍。教科书强调洪仁玕“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然后介绍他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的政治上尊重社会舆论、杜绝贪污,经济上发展工矿、开办银行、设立邮局,思想上反对迷信等主张,还强调他是“传播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人物”,^⑤反映劳动人民在历史叙事中正扮演着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角色。

工人是近代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新中国初期的历史教科书对工人运动的书写也基本遵循“劳动剥削——矛盾激化——工农运动——社会变迁”的范式。在1952年以前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中,已经有工人以罢工的形式支持五四运动的叙述,对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介绍中也有对这些工人运动展现出的革命性的肯定,强调中国工人阶级参加五卅运动与省港大罢工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光荣的一页……奠定了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革命的基础”。^⑥1955年后的大纲版教科书强调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一个技术比较熟练的男工,每日所得的工资最高不过二角六分,女工最高不过一角六分”,工人的劳动时间也很长,每日做工“十一小时以上”,且这些工作都是在劳动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进行的。《马关条约》签订后,无产阶级的劳动状况进一步恶化,西方各国开始大规模在中国投资设厂,“外国工厂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从事商品生产,直接剥削中国人民,榨取高额的利润”。同时,列强在每次侵略战争胜利后又向中国索要大量战争赔款,使“人民生活更加痛苦”。^⑦以“剥削性”来衬托“革命性”,在长期的被剥削中积蓄力量的无产阶级最终在五四运动中走上历史舞台并成为“最有威力的一支队伍”。^⑧

新中国初期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以社会形态演变为叙事主线,强化对劳动人民在社会形态演变中作用的书写,给予农民起义与工人运动日益丰富的塑造。“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与“劳动创造人”及“劳动工具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共同构成新中国初期历史教科书中劳动理念书写的

① 李庚序、王芝九编《初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1册,第34页。

② 叶螭生编《初级中学中国历史课本》(修订本),第34页。

③ 黄祖英、沈长洪、陈怀白《初级中学适用暂代课本——近百年史话》中国近代史下册,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10页。

④ 宋云彬、李庚序编《高级中学课本 中国近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第55页。

⑤ 苏寿桐、王仁忱、沈镜如、孙守任编《高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3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35、36页。

⑥ 胡华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66页。

⑦ 苏寿桐、王仁忱、沈镜如、孙守任编《高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3册,第49、67、88页。

⑧ 刘惠吾、牛连海、古堡、王维礼、常城、郑餐霞编《高级中学课本 中国历史》第4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

三个主要方面,而这种书写还使“生产力范式”与“生产关系范式”视角下的历史叙述完整地建构起来。

四、劳动理念书写的价值及意义

历史学科在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学历史教科书是向青少年传播历史知识,借以塑造其历史观的重要工具。新中国初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劳动理念的书写,对于青少年唯物史观的形成,以及尊重劳动人民观念的养成等方面均发挥重要作用,其价值和意义值得深入讨论。

第一,加速了对青少年唯物主义劳动观的塑造。国家各部门特别是教育部门经过几年的努力,青少年的劳动观念有了显著提高。1957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即指出“经过几年的劳动教育,青少年学生“对于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剥削阶级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①当然,对青少年劳动观念的提高来自多方面的合力作用,但历史教科书中的劳动理念书写占有重要地位,其劳动理念教育加速青少年尊重劳动人民、热爱劳动意识的塑造。

新中国建立后,中共中央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普及工作,组织编写适合普罗大众阅读的材料,一批批体现唯物史观的读本先后问世。在学校教育中,加强各类教材尤其是历史教科书中唯物史观的书写,成为唯物主义宣传的重要方式。新中国青少年唯物史观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新中国初期的历史教科书。新中国通过“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劳动理念”的逻辑路径将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需求落实于历史教科书。促使他们形成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树立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而奋斗的人生观,以及学会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进行价值判断。

第二,有利于养成青少年尊重劳动人民的观念。新中国建立后在政治、法律、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给劳动人民以崇高的地位,为在历史教育中强化劳动理念的塑造提供了宏观背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强调“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②1954年,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新中国的根本大法明确规定“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国家鼓励公民在劳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③从热爱劳动到劳动光荣,伴随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劳动在法律层面取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非常重视对劳动模范的表彰与宣传工作。1949年至1956年,国家举行了两次大规模、高规格的劳模表彰活动。新中国以国家基本大法为根基,确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确立了劳动光荣的基本准则,又通过表彰与宣传工作对在劳动生产中取得光荣成绩的劳动模范们予以高度赞扬,劳动光荣成为新中国建立后被塑造并确立起的一个重要社会价值取向。教科书中劳动理念书写的加强,与社会中浓郁的劳动光荣的氛围相呼应,对青少年养成尊重劳动人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校毕业生劳动生产教育的通知》,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736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9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453页。

民、热爱劳动的观念形成了互动效力。1954年,政务院对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学教育给出明确指示,即:中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劳动观点,将劳动看作是光荣的事业,热爱劳动,对劳动具有自觉的积极的态度”。^①上述措施无疑有利于青少年尊重劳动人民观念的养成。

第三,加速了新一代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为谁培养人,培养怎样的人,这是国家在兴办教育时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习仲勋在1954年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用先进的科学知识、社会主义的思想、热爱劳动和遵守纪律的精神,去教育青年和儿童的一个重要目标即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②历史教学大纲颁布后更是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初中学习中国历史,是要使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自觉的积极的建设者和保卫者”;初中学习世界历史,是要使青年一代能够“自觉地、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中学习中国历史,是要使学生“自觉地、积极地保卫祖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中学习世界历史,是要使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的自觉的建设者和保卫者”。^③一言蔽之,培养出能够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劳动觉悟的爱国青年,是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加强劳动理念书写对现实需求的映射。

1957年,新中国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起独立自主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他各项社会事业也取得很大发展。同年,新中国也全部完成了大纲版历史教科书的出版,在劳动中飞速发展的新中国经济建设与在发展中不断强化劳动理念书写的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都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就。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社会的进步,可以说是新中国劳动人民的劳动实践与国家劳动理念塑造的有机互动的结果,是“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的现实验证,^④也是唯物史观强调的历史偶然性中必定蕴含着必然性的现实写照。

新中国初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劳动理念书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新中国初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综合作用的产物。新中国初期的历史教科书通过塑造劳动理念,促进青少年学生唯物主义历史观、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人生观、以劳动为荣的价值观的形成,在历史的维度上回答了为谁培养人、培养怎样的人的教育根本之问。新中国初期的历史教科书在叙事中展现的劳动理念与新中国社会劳动光荣氛围,一同镌刻出一个鲜明的时代印记。

(作者焦润明,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洪业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10136)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尹媛萍)

①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175页。

②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294页。

③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136、166、196、182页。

④ 毛泽东《实践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9页。

this idea to frame historical narratives , undertaking the mission of building a common history of the nation to pave the way for the state building project.

Writing of Labor Concepts in Middle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in the Early Year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Jiao Runming , Hong Yezhi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the state strengthened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th on core socialist values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history textbooks. Its goal was to instill students with a materialistic concept of labor to cultivate a worldview that respected working-class people and loved participating in labor. "Labor creates people" , "labor tools are the symbols of social development" , and "working-class people are the creators and promoters of history" were the core writing paradigm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revolutionary history paradigm was a reflection of the general social atmospher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which was focused on the promotion of materialism and of the glory of labor. It highlighted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working-class people and had extremely positive impact on society.

The Past and Future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Criticism // Zhu Luchua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criticism has a long history and rich heritage. The accumulation of criticism on historical works over the course of thousands of years became the general trend of this sub-discipline and shaped its development. It both widened the scope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uplifted its theory. From commenting on history books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ing historiographical discipline , it furthermore induced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historiography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 crystallizing into a methodology of historiographical criticism. This process both provided inspiration of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Exploring and revealing these paths and the law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criticism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more clearly why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an continuously develop into a knowledge , a discourse , and a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Knowing Is to Bring about Change: Ray Huang's Diagnosis of the "Hongwu-style Financial System" // Gao Shouxian

Ray Huang's research on water transportation and finance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not only the starting point of his academic career , but also the basis of his historical concepts. He called the financial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founding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 of China Zhu Yuanzhang "Hongwu-style Financial System" , arguing that this system had remained so rigid for such a long time that even continued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Huang's "Hongwu-style Financial System" has been gained a wide popularity and accepted by non-academic audiences , but it has also been severely criticized by some professional scholars. In fact , his historical research follows an approach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professional scholars. It is difficult to measure it by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His historical research was born out of his unique experience of war and chaos. In essence , it belongs to the "historiography of political commentaries" with "knowing is to bring about change"; and his "Hongwu-style Financial System" can be regarded as a representative case highlighting the "absurdity" of the Ming dynasty's financial syste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 His position and views are obviously biased , if we carefully examine his specific comments on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 we may find many "profound but one-sided" views.